

红色往事

走进

怀仁堂



亲历者讲述共和国历史风云
知情人披露中南海要闻往事

董保存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红色往事

走进

怀仁堂

董保存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怀仁堂(二)/董保存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54-0181-2

I. ①走… II. ①董…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2196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柯琳芳
责任编辑 胡志华 晋璧东
责任校对 康莹
装帧设计 古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印张 插图 30 幅 2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 / 1

- 聂荣臻回忆“杨余傅事件”真相。
- 空军政委余立金快到屋门口时，冷不丁从黑暗中扑上来四条汉子，给余立金戴上了手铐，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背……
-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
- 傅崇碧明白自己是被关押了，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之间成了“阶下囚”。
- 是谁看到了不该看到的，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 两封匿名信，又一导火索。

波及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 76

- 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毛泽东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和王力也赶到这个江城火炉。
- 毛泽东明确说：“我们为陈再道保驾！”
- 情况突变，武汉三镇吼声如雷，毛泽东所在的东湖，冲进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 一封江青亲笔签署的信件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
- 毛泽东一句话，使得许世友这个硬汉子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耸人听闻的“城南庄事件” / 95

- 聂荣臻企图谋害毛泽东？
- 一份电报解开谜团，审讯工作开始……
- 两包毒药，交到刘从文手上，他的手发抖了。
- “内奸”并不仅是刘从文一人。



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 / 105

- “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 谭震林迈步走进怀仁堂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主角。
- 谭老板有意见，不只是会下议论议论，他是要“放炮”的。
- 给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谭老板继续抗争着……
- 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 有人揭发谭震林是大叛徒！
- “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文革”中的粟裕 / 162

- 毛泽东的一句话，周恩来的运作，粟裕才没有被打倒。
- 在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压力面前，他一言不发。
- “粟裕的耳朵很灵的呀，怎么就是没有听见要请江青同志讲话呢？”
- 粟裕给军委写了一份比较“堂皇”的书面报告，又独自给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作了口头汇报。

宁折不弯张经武 / 170

- 张经武究竟是怎么死的？
- 张经武走进红墙，又走出了红墙。
- “有我这样的假党员吗？”
- “我怎么会是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是毛主席派我去西藏的！”
- 至死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 宁为玉碎，不求瓦全。

庐山云雾中的郑维山 / 182

- “在政治斗争上，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有时还是很幼稚的……”
- 林彪的“突然袭击”一个讲话，让他们相信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 “六号简报”出笼之谜。
- 毛泽东震怒，写下了言辞激烈的《我的一点意见》。
- “只要从手术台上下来，胜利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

江渭清在毛泽东面前讲真话 / 200

- 公共食堂好还是糟？

- 毛泽东见江渭清面有难色，说：“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说！”

- “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

陈少敏就是不举手 / 206

- 长达 18 天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始终不表态。

- 她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中共中央给刘少奇摘掉那三顶“帽子”。

- 陈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会上敢投反对票，是由她的党性以及她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

吴忠“有忠” / 227

- 吴忠“有忠”说法的由来

- “九一三”事件中的吴忠

- 卫戍区里的吴忠

参考书目 / 240

再版后记 / 242

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

- 聂荣臻回忆“杨余傅事件”真相。

- 空军政委余立金快到屋门口时，冷不丁从黑暗中扑上来四条汉子，给余立金戴上了手铐，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背……

-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

- 傅崇碧明白自己是被关押了，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之间成了“阶下囚”。

- 是谁看到了不该看到的，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 两封匿名信，又一导火索。



序 篇^①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1968年3月22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有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口人。

3月24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3月8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搞了60多个小时才恢复正常。当时我住在西山，他们打了3次电话，让我去参加大会。我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同志回来告诉我的。会上，林彪一伙做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坐在台上。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这些同志有问题，是属于可以被冲击的对象。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林彪讲话以后，康生接着讲话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

^① 本文是《聂荣臻回忆录》最后一章中的一节“所谓‘杨余傅事件’”。经聂帅生前同意，本文作为代序。

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人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果然，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我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6日，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我，但也没说我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

4月7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同上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4月10日，周恩来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16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



▲ 毛泽东席地而坐，杨成武紧随其后。



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1974年7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1979年3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联系到“杨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对和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使许许多多的干部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对党内团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从林彪开始整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到1971年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大整郑维山同志，说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还诬蔑我“从19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九一三”事件以前，“四人帮”说“华北山头”是反对林彪的；“九一三”之后，一夜之间，忽然又说“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当然，这些已经都是历史的陈迹，1979年12月，党中央已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问题澄清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是很难一下消失的。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狠整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呢？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就首先要将北京军区的军权夺到手，才能够放心。

事实上，我自从不兼华北军区的职务以后，从来不过问军区的工作。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这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待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始终是这样做的。北京军区机关华北的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多一些，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我想，其他军区的干部状况也大体如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地区的干部多少，而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在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相信，北京军区所有原华北地区的干部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的。我希望，北京军区的所有干部，不论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都不应该有宗派主义，要特别注意团结好；在党中央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要搞五湖四海，把北京军区建设好；用实际行动来肃清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流毒，来回击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诬蔑。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五个回合”

1968年的早春3月，我国北部地区依旧是天寒地冻，朔风凛冽。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着神州大地。北京人裹着蓝色的、灰色的、军绿色的冬装，抵御着冷彻骨髓的春寒。

自然界的寒流，总还可以抵御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寒流，人们却无力抗拒。这时的北京人，正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动乱之中。今天这个被打倒，明天那个团伙成了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何其多矣，时时有新的挖掘，处处有触目惊心的揭露！人人自危，不知会有什么灾祸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3月26日的夜晚，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出现了一条白色的刺人眼目的巨幅标语：

“打倒杨余傅！”

“打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人们对政治信号极为敏感。第二天，北京城内的工农兵、学生乃至街道居民都在纷纷议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出事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没有发表任何新闻，但北京的老百姓却已在交头接耳，传递着小道消息：“杨成武勾结余立金、傅崇碧，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迫害江青同志，冲击中央文革，破坏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抓起来了！”

“傅崇碧带了两辆大汽车，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地冲进中央文革的办公室，吆喝吼叫地要抓人！”

“杨成武和空军政委余立金，弄了一架大飞机，把贺龙送到苏联去了！”

“傅崇碧的秘书，把枪藏在提包里，要打江青呐……”

3月27日下午，中央文革在东郊的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这个会上，“民间”流传的消息，得到了“官方”的证实。

坐在工人体育场看台上的，有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叶群、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还有周恩来总理。

就是在这个会上，宣布了经毛泽东、林彪批准的中央文件：

1. 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2. 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3. 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就是在这个会上，江青宣布说：“杨成武背后搞阴谋，搞小山头，搞极小极小的一个山头，而不是搞中国的大山头，世界革命的大山头。他招降纳叛。在3月8日，傅崇碧不经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什么问题！……他们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



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

就是在这个会上，康生说：“杨成武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两面派、两面三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阴谋家。正如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所讲的，他反对罗瑞卿是假的，他本身就是罗瑞卿分子；他反对‘彭罗陆杨’是假的，他本身就是彭真的亲信分子，彭真的黑帮分子；他反对贺龙是假的，他实质上是依靠贺龙，继续贺龙的路线，去夺取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夺取空军的大权……”

就是在这个会上，陈伯达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所谓“五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击退去年的‘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第五个回合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阴谋，把他们打倒了。”

就是在这个会议的前后，他们声称：打完这五个回合，便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了。

在江青、叶群等人的带领下，不明真相的学生狂呼着口号，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拥出了这座圆形建筑物。锣鼓声、口号声、广播喇叭声乱成一团。

紧接着，全国各大中城市也效法着北京的形式，召开声讨批判大会，举行武装游行，庆祝粉碎“杨余傅事件”的伟大胜利。其场面之壮观，其声势之浩大，其影响之深远，甚至超出了制造这一事件的人的预料。

狂热归狂热。狂热的背后是什么呢？

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在这政治的重压面前，压抑住心头的怒火，希望这场大灾难赶快结束。

江青在大会上连呼了十几个“打倒”。其实，他们要打倒的，何止十几个！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多少人在他们的打倒声中沦为“阶下囚”？多少人在他们的打倒声中死于非命？北京城已经被“打倒”的声浪所淹没。人们的心在这“打倒”声浪中僵化了，撕裂了。

北京的老市委书记彭真被打倒了，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大将罗瑞卿被打倒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被炮打，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被炮轰，开国元勋朱德、贺龙、谭震林等人也未能幸免！

中央有人被打倒，中层干部就毋庸置疑。到了基层，所有的党支部书记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今，被打倒的名单上，又添上了三位将军。

想起来就令人心寒的年代啊！

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所有这些打倒，均属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全面发动的阶段。在这特殊的阶段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正在崛起，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正在变成行动。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津津乐道的几个回合，都发生在这个阶段中。

通过这一个又一个的回合，他们在党中央的地位逐步加强。林彪的名字，居然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里，还被康生说成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创举”。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回合，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障碍一个又一个被清除。顺他们者，青云直上，委以重任；逆他们者，统统打倒。一时不能打倒的，也要先拉下马来。

现在看，他们的“第五个回合”，纯粹是为了把要害部位的军权，夺到他们手中。总参谋长的位置自不必说，空军的机动能力强，又是林彪的“小舰队”所在地，不把空军政委搞掉，就不能把空军实权抓到手。卫戍司令的位置更为重要，对傅崇碧，他们很不放心。只有将这三个要害部位拿到手，他们搞政变、篡党夺权才会有重要的依托——“九一三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们的“第五个回合”，还有一个罪恶目的。就是借此把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杨余傅”有后台，后台就是“聂、叶、陈、谭”。这些人在周恩来、毛泽东同志的保护下，还没有被他们彻底打倒。以反“山头主义”为名，先将“杨余傅”搞掉，看谁还听这些老家伙的！看谁还保护这些“老反革命”！

他们的“第五个回合”，是一个大骗局。既骗了当时不明真相的群众，又骗了深居简出的毛泽东主席。

让我们将历史的日程，翻回到1968年的3月，重新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气氛，重新看看林彪、“四人帮”的卑劣行径吧！

宫廷政变式的逮捕

一阵急促尖利的电话铃声，把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吵醒。他下意识地看看桌上的闹钟，时针已经指到1点钟。是3月23日凌晨了。

他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秘书的声音：“余政委休息了吗？”

“休息了。”

“请他起来一下，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好吧。”

秘书答应着，赶忙穿好衣服，跑上楼去请余立金。

最近一段时间，余立金忙得不可开交，当晚11点钟，还在听取空军所属院校学习“两报一刊”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情况汇报。



这会儿他刚刚睡熟。秘书知道，余政委之所以忙，是因为司令员吴法宪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的负责人，空军的事情顾不过来。

两天前的夜晚，吴法宪曾打电话请余立金到他的家中，向他交底：“空军的事情，你要多管。我在那边（军委办事组）忙得很哩。有些事情，你不用请示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余立金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说：“你是第一书记，应该报告的一定报告，这不能含糊。”吴法宪做出很真诚的样子，说：“你该做主的就做主吧，不必请示。”

余立金被叫了起来，他披着睡衣问：“什么事？”

“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急事商量。”

余立金说：“会不会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秘书说：“不像。他说是有急事商量。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

余立金说：“也是。”

走下楼梯，秘书问：“首长，还要不要叫警卫员？”“不要了，这么近。”余立金说着，走出楼门口。

秘书想，余政委和吴司令住的房子距离最多只有50米，都是在首长的住区内，住区的门口有岗哨，这里的安全是不会出问题的，也就没有再叫醒睡意正浓的警卫员。他年纪小，正是要多睡的时候。

走出余政委家的后门，门框有点活动，秘书说：“明天跟他们讲一讲，把门修一下。”

余政委没有说话，大步向前走去。北京严冬的夜，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刻。寒风吹在脸上，冰凉冰凉，更显得寒气逼人。

吴法宪家的院门敞开着，两层小楼除了楼下客厅里有灯光，别处都是黑糊糊一片。客厅的窗帘很厚，透出微弱的灯光。

从院门到屋门口有20多米，院里种满了花草和果树，黑暗中显得灰蒙蒙的。

快到屋门口时，冷不丁从黑暗中窜出四条汉子，为首的一个问：“是余政委吗？”

“是。”余立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回答他们。

这四个人忽地一下子扑上来，其中两个扭住余政委的胳膊，“咔嚓”一下，戴上了手铐。

余立金挥动着被铐住的手，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进屋去说！”

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背。另外几个人连推带搡地把他推进吴法宪的客厅。

这位红军老战士满腔怒火，对已经坐在那里的吴法宪说：“你们这是要搞政变！凭什么铐我？”吴法宪的五短身材从沙发上弹起来：“铐你？铐你是好的！”

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的政委！你们要干什么？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嘿！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

前来探病的吉普车

余立金被非法逮捕的时候，杨成武一家人正在梦乡之中。他的秘书张忠庆接到空军余立金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张秘书吗？我是单秘书。刚才吴法宪的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空军政委怎么能叫司令员的人铐起来？听到这个特殊的情况，张秘书觉得非同小可。他的第一反应是：要立即报告患美尼尔氏症在家休息的杨成武。

他站起身，又迟疑起来，猛然想起了今晚来探病的三位不速之客。

第一个是吴法宪。

吃过晚饭不久，吴法宪的黑色吉普车来到杨成武的家。

秘书见吴法宪来了，正准备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嘿嘿一笑：“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

吴法宪走后，秘书觉得空军司令员来汇报工作，还是需要向代总参谋长报告一下的。

秘书走进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将这一情况作了报告。杨成武说：“你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身体不好，不要让他来了。”

秘书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找到了吴法宪的警卫员小刘，问：“吴司令员现在在哪里？”

“正在开会。”

“能不能找他一下？”

“恐怕不行。首长交待过，开会时不能找他。”

“请你转告吴司令，开完会给杨代总长这里来个电话。”

……

第二个、第三个是林彪的秘书。

深夜 12 时 30 分左右，门卫报告说：“林副主席的秘书来了。”

张秘书忙出来迎接他们。两位来者单刀直入地说：“101（林彪代号）要我们来看看杨代总长。他的病情如何？”

张秘书说：“已经吃过药，睡着了。”

“我们来了，总得要见一见。”

林彪派人来探病，并且执意要见，秘书只好领他们走进杨成武的卧室。

杨成武在安眠药的作用下，已经睡熟了。秘书把他叫醒。

林彪的两个秘书走到杨成武的床边，一个说：“101 对首长的病情很是关心，特让我们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他们又说了几句安心养病之类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送走他们，张秘书回到办公室。

刚刚打个盹，空军的电话就来了。这三个不速之客与吴法宪铐走余立金有什么联系吗？

他拿起电话，要通了杨成武的卧室。

接电话的是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听完秘书的报告，她很吃惊，说：“是吗？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哪里知道，林彪一伙的黑手，正在越来越近地向他们伸来。

凌晨 2 时许，驻杨成武家附近的卫戍部队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不许开灯，不许喧哗，由来人带领，一口气被拉到了景山。

与此同时，新来的部队包围了杨成武的住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进楼里。“咚咚咚”的敲门声、喊叫声、呵斥声乱作一团。“出来！”“不许动！”“跟我走！”杨成武的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赶进了楼下的客厅里。门口站了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人到了楼上，敲开了杨成武的门。

杨成武穿一身睡衣，站起来看了看他们。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李作鹏站在后边，眼睛被那副变色的眼镜挡了个严严实实。他们身后的战士手执短枪，如临大敌。

杨成武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想问问总理是怎么回事。可电话线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

“怎么回事？”他火了。

邱会作很有几分得意地笑着。

李作鹏仍旧在一旁不动声色。

“走吧。”随他们来的人催着。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搞的？他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抬脚迈出屋门。邱会作带来的“警卫”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进厕所。

这些情况足以表明，外面发生了大的变故。他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的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几个人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

杨成武的这几句话，震慑了邱会作。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审判邱会作时，他还说：“想起杨成武的那句话，至今我还心惊肉跳。”

杨成武走下楼梯的时候，心里很不平静。两天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去世，刚刚火化。由于身体不好，不能亲自将生父送去火化场，只能在父亲的遗体前肃立默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77岁的老母，此刻也被他们关在了客厅里。此去凶多吉少，需要和老母亲说两句话。母亲失去了老伴，身体又多病，儿子若再有个三长两短，她能承受得了吗？

“我要跟我的妈妈说几句话。”

“不行！”一个粗暴的小头目毫不客气地拒绝。

杨成武气得脸色青紫，他晃动着魁梧的身躯，用肩膀把讲话的人顶到一边——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大的劲头，竟把那人撞了个趔趄。

他走进客厅，望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坐在冰冷的乒乓球台上，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老人家受苦受难一辈子，到晚年只希望儿子为她养老送终啊！

杨成武毕竟是久经考验的战将，他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这是吴法宪搞的！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

老妈妈点了点头。她听懂了儿子的话。

杨成武又对家人、秘书和警卫员说：“要相信毛主席、共产党，事情会搞清楚的。”

“快走，快走！”

杨成武走出屋门，见有辆黑色的吉普车停在楼门口。车门打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邱会作捷足先登，钻了进去。李作鹏伸伸手，示意要杨成武进去。等杨成武进去后，他也紧跟着钻了进去。邱会作和李作鹏一左一右给他“保驾”。

车子在京城的小胡同里钻来钻去，杨成武警惕起来，问：“去哪里？”

“人民大会堂。”

“为什么往西走？”

“为了安全。”

这次，他们并没有骗他。车到西四后，转弯向东，经西安门、府右街直朝正南，到六部口往东，车的左侧出现了中南海新华门的卫兵，右侧很快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灯光。

杨成武神经异常紧张。他不知道在这座雄伟的建筑里面会发生什么。不过，这位有着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的将军抿紧了嘴角，准备迎接突然袭来的一切。

凌晨2时的突然任命

电报大楼的时钟，响亮地敲过了12下，已是1968年的3月23日。

此刻，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口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楼里，第六层会议室灯